

传播符号学理论

走向符号学：新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蒋晓丽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生态与格局，也使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大大降低。在此语境下，寻求突破与创新是新闻学研究必须有的的一种态度。从符号学视野来看，新闻的生产、传播与收受，其本质是一系列符号化过程。鉴于此，走向符号学，有助于新闻学研究获得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符号学 新闻学 传播 能指游戏

DOI:10.13760/b.cnki.csa1t.2015.0063

一、现实语境：新媒体技术发展与传统新闻理论解释力降低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新闻学研究，是一门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为对象，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专业化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为中心，以探索新闻及新闻业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新闻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专业新闻机构与职业新闻人如何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新闻事实的职业理念等为内容的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格局中，在新闻传播实践主要以专业化、规模化的新闻传播机构为主体的传媒语境下，这一学科定位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与说服力。

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的大力发展，随着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新闻传媒格局与新闻传播生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媒体受到的剧烈冲击，我们每个人都能切实感知到：新兴媒体已经非常广

泛而且深刻地嵌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各种网络新闻APP以及移动社交媒体新闻的推送方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接收新闻信息的方式,各种公民新闻的手段与样态,已经严重冲击到了新闻机构专业化新闻生产的地位,进而也使得专业化新闻机构与专业新闻人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挑战,近几年来涌现的专业新闻人离职潮就是这种冲击的最有力证明。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困境。

而就新闻传播学学科来说,用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在《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一文中的表述就是:“一直显得底气不足而且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①就研究路径来说,新闻传播学研究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学术内卷化”状态,用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做新闻学研究的人大多都只停留在一个规定的历史情景中发问,在原有的知识体系里围绕着自己或前人的工作转圈圈,处于对已有的研究思路、研究路径的高度依赖与自我锁定状态之中,研究成果虽有“量的增长”但却遭遇“质的停滞”,进入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亟须进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拓。^②不仅如此,浙江大学李思屈教授也曾谈到过,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经典的传播研究范式,如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知沟、扩散等,在面对上述丰富而复杂的传播现象时,早已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预见力……一些耗资巨大的实证研究过程烦琐,而结论却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看似创新却难掩理论的贫乏和精神的苍白”^③。更何况,我也在拙文《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中探讨过,如今占据新闻传播学统治地位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客观新闻学”,而客观新闻学所寻求的“客体之真”,有着诸多无法克服的困境,因此也造成了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应然与实然混淆不分的局面。^④这些,都是新闻传播学发展一直以来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困境。

那么,面对上述现实语境与理论研究困境,新闻传播学到底该走向何方?新闻传播研究该如何进行理论创新,重建自信,再添活力?

①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载于《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②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载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③ 李思屈、刘研:《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

④ 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二、同源共性：作为一种符号化产物的新闻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一门关于符号的科学。广义的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人文科学。狭义的符号学，也即如今引起重大反响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并逐步兴盛至欧洲各国，以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为源头的科学。由于人是符号的动物，整个人化的世界，都浸泡在符号里，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类的心灵与符号作用不可分离，人类文明建立在符号与符号系统上，人对外在世界，甚至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都是通过符号获得，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免不了对人的精神、思想与意义的追问，因此，符号学也是一门用于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符号现象进行分析的学科，一门被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公分母”“数学”的工具学科。

不难看出，符号学本身就有着传播的基因。早在1964年发表的《符号学原理》中，巴尔特就阐述道，“大众传播的发展会使得人们空前关注“意指”这一广泛领域，此情势必然会使得符号学呼之欲出”^①。《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的作者霍克斯也认为，“从长远看来，两者（指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都应包括在第三个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做传播学（communication）”^②。而作为传播学渊源之一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指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可见，传播学毫无疑问是与符号学血缘最为亲近的学科之一。因此，在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正如李思屈教授所言，“无论传播技术如何发展，传播现象怎样纷繁复杂，人与符号的互动都是传播行为的基本结构”^④。

作为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传播现象，新闻与符号学之间的同源共性关系可以表现在新闻传播的层层符号化过程中。我们知道，传统的新闻学理论对新闻的主流界说有三种——以邵飘萍等为代表的“事实说”，以陆定一等为代表的“报道说”以及以宁树藩等为代表的“信息说”，分别对应着新闻的“本源形态”“传播形态”与“收受形态”，新闻要素中的“新闻事实”“新闻人”

①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

② 转引自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④ 李思屈：《当代传播符号学的三种趋势》，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新闻受众”，以及新闻发展历史中的前新闻业时代、新闻业时代以及后新闻业时代。然而，这种将新闻传播分离为三个环节的做法，对今天的开放、连续、动态、融合的新闻传播来说，是不适切的。相反，从符号学的视野来看，新闻传播自客观实在世界的“事实”被当事人或目击者感知为“新闻事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人的符号化过程中；而后通过新闻人的认知、理解与写作将“新闻事实”转化为“新闻文本”，历经二度符号化；最后再在新闻受众对“新闻文本”接收与解释的过程中实现三度符号化。^①正是在这层层符号化过程中，新闻传播才实现了从客观实在世界的“事实”，向本源形态、传播形态以及收受形态的“新闻”的转化。此外，除“事实”之外的人的语言、评价等，其作为新闻传播之重要构成部分，本身就是二次甚至多次符号化的产物。由此观之，新闻的本质就是外在客观世界的事件被人符号化后的产物。在符号学与新闻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与相通性，走向符号学，与其说是对新闻学的又一次再造，不如说是新闻学对自身本原的一次回归。

三、交叉融合：新闻符号学研究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做”

那么，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其研究特点是什么，研究价值何在，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包含哪些，该秉持什么样的研究立场，等等问题，需要我们逐一思考。

什么是新闻符号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一种以符号学的视野来审视新闻，以一套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新闻的取向。其最重要的特点，借李玮在《新闻符号学》一书中的说法即是：摒弃客观新闻学将新闻视为对客观现实实践的一种简单“反映”的做法，而是立足于“符号”“符号化”“文本”“意义”几个符号学基本概念，以“新闻文本”为核心对象，将新闻视为一种意义生产实践，将新闻文本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来探寻新闻从其文本生产、传播、收受过程中传播者、新闻文本、收受者之间价值意义共建的符号学机制。^②

为什么要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其直接原因，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是缘于对传统占据主导的“客观新闻学”所遭遇的多重困境（传

^① 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② 李玮：《新闻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39页。

播主体认知的有限性与多样性困境、传播符号的片面化困境、传播受众的认同困境、新闻传媒机构的属性与功能困境、道德伦理困境、法律困境以及外在语境变化困境)的克服与超越。^①至于其终极价值,则如李思屈教授在阐述传播符号学时所言:“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考,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适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基础上的整体正义,替代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②换言之,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研究,其直接目的在于找寻到一种能够化解传统新闻学矛盾与困境的方法,其最终价值则在于能够构建一种有利于平等、多元、正义地进行新闻传播的观念。

在符号学的几个分支中,与新闻学研究具有更好適切性的是哪些?我们知道,符号学至今已经发展出四个特色明显的分支:以索绪尔、巴尔特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以皮尔斯、莫里斯等为代表的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逻辑符号学;以卡西尔、苏珊·朗格等为代表的哲学艺术符号学;以福柯、葛兰西、洛特曼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其中,前两个分支侧重于符号本身以及符号学基本原理,后两个分支侧重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艺术审美与思想形态。就现有的新闻符号学研究文献看来,除了哲学艺术符号学这一偏向有意味的形式审美分析路径之外,其他三个分支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围绕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与巴尔特的意指、神话来进行微观、具体的新闻文本表意过程分析的研究,数量最为庞大。结合社会文化语境来进行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力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在对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所产生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的探讨中最为常见。而借助于皮尔斯的以理据性为依托的“像似符”来研究新闻,则集中体现于视觉转向后的当代媒介社会:“皮尔斯对符号类型的划分,使社会文化学界,尤其是现代传媒领域受惠颇深。现代媒体途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电视、互联网甚至广告、手机,都成为当代最新型的媒介传达手段,视觉媒介便成为主流媒介形式。所谓当代社会的‘视觉转向’,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因此,社会文化学界十分偏重以皮尔斯的‘像似符’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对象。”^③

新闻符号学研究内容主要有哪些?四川省社科院李晖曾试图对新闻符号

① 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② 李思屈、刘研:《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

③ 张碧:《社会文化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学研究的范畴进行框定,包含:“(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新闻叙事学”研究、“新闻修辞学”研究、“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六大组成部分。^① 西北大学李玮认为,新闻符号学研究的重心在于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探析新闻文本的表意机制与策略。基于此,她在《新闻符号学》一书中探讨了新闻文本的符号意指机制、双轴运作机制、符号衍义机制、伴随文本机制以及异项标出机制。^② 不难发现,李晖的范畴划分(包括每一部类的内涵、部类之间的关系)不够明晰,李玮的理解则可能造成窄化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后果。实际上,在新闻学与符号学的交叉研究上,我们不仅要借用符号学的工具性,更要重视符号学的本体性。对新闻的符号学研究,不仅要以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析新闻传播实践与问题,同时也要以新闻传播领域的特殊性来反哺符号学。在我看来,具体来说,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包括:(1)从社会语境与学术需求方面入手,探讨新闻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其价值意义或可能带来的问题陷阱;(2)立足于不同类型的新闻文本,对新闻话语的内部结构进行较为微观的叙述学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3)立足于不同的国家、社会、文化,对新闻生产、传播与收受过程进行较为宏观的认知、交往、权力与意识形态分析;(4)基于与其他符号学应用门类的对比,发掘新闻学对符号学的反哺与贡献。

新闻符号学研究到底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与价值判断?在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看来,传播符号学的本质就是批判性的。他说,传播符号学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切合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日渐盛行与传媒呈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与泛娱乐化的现实语境,以及传播学在观念与方法上向批判学派靠近的内在动力与学术需求。因此,“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将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增添批判学派的学术背景,使技术分析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方向获得相互补益的效果”^③。而李思屈教授却指出,基于“内容生产与符号消费的地位日益突出、意义的生产与符号的消费在传媒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现实语境,“当代传播符号学”应从“批判”的研究范式转换到“积极回应”现实语境的“建构”研究范式,力争使得传播符号学研究能进入到传媒产业发展的前沿,对当前传

① 李晖:《论新闻符号学的理论建构》,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181~185页。

② 李玮:《新闻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媒产业的新业态、受众的消费方式和深层消费动因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研究。^① 其实,在进行新闻符号学研究时,该建设还是需批判,非此即彼、厚此薄彼都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更可取的态度,客观中立地去弄清新闻传播领域中的符号学规则与规律,使研究结论既可以满足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收受者的建设性目的,也可以为他们批判性地抵制不平等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

四、危险地带:新闻符号学研究需要警醒的问题

虽然符号学视野能够为新闻学带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能够为传统新闻学的困境提出一些解决之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符号、符号化与符号学的某些属性保持警醒。

赵毅衡教授告诉我们,在符号表意过程中,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而任何具体的符号解释,都会受制于文本自身携带的元语言(文本自身标明的东西,如文本体裁能激发解释者的不同解释期待,指导解释者以不同的解释方式去接收)、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在符号使用过程中,由于文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引出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信息解释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挤压,即作为外部条件的语境产生意义),以及解释者自身的能力元语言(指来自于解释者个体的社会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包括他所有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实践,他记忆积累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所有解释活动经验积累以及他的感情和信仰等)三种元语言。^② 也即是说,即便是面对同一符号文本,表意和解释语境的改变,以及符号解释者的不同,都会造成文本解释结果的不同。这就使得文本解释成为一个充满了主观性与偶然性的行为。既然如此,当我们用符号学理论与方法来进行新闻文本分析时,我们又该如何去保证我们的分析不是由于我们过于强势的元语言——符号学而导致的主观化片面化的选择,不是一种通过简化的理念性的强化来拒绝事实和现象的多样性的行为呢?如何能够证明我们的结论不是一种独断、武断的存在?

不仅如此,正如赵斌在《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流行文化》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符号学先天具有一种能指游戏倾向。“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

① 李思屈、关萍萍:《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3~234页。

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尔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①很显然,这种能指游戏倾向其实质就是能指的膨胀,必然导致一种越来越脱离经验世界的、关注话语与符号远多于关注经验现象本身的行为。这种“如若‘走火入魔’‘玩物丧志’,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那么确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践”^②,对新闻文本这一与外在客观世界有着特定指称关系的纪实性表意文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鉴于此,正如我为《新闻符号学》一书作序时所提到的,新闻符号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在解决传统新闻困境问题的同时紧守新闻文本的“纪实性”本质,如何扮演好“新闻学的先锋、符号学的后卫”这一角色,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简介: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载于《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3日。

^② 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载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